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3.2

社会学作为志业

André Béteille, Jacklyn Cock

中东政治

Mustafa Attir,
Sari Hanafi,
Feras Hammami

葡萄牙对危机的回应

José Soeiro,
Dora Fonseca,
Maria Luísa Quaresma

- > 台湾社会学的三波转向
- > 小国社会学
- > 智利的道德议题
- > 智利的环境政治
- > Santiago的移民
- > 国际化社会学
- > 美国社会学衰落中？
- > 巴尔干化之外的巴尔干岛
- > 跨学科性
- > 社会学和社会转型
- > 全球社会运动
- > 联合国的青年参与
- > 影像社会学：真实的Bedik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2期 / 2013/2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面对不平等的世界

我在 Ramallah 写下这篇文章。Ramallah 是巴勒斯坦政府在 West Bank 的行政中心，也是一处例外之地：这里所见的宰制型态影响着社会学知识的生产，程度并不亚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地理切割、随处可见的检查哨、以及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其土地的高墙等等，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遂行以色列的单边扩张。若说 Gaza 所遭受的是一连串炸弹攻击的迅速与恐怖的暴力，那么，以这期全球对话中 Jackie Cock 的文章角度而言，West Bank 正在经历的则是慢暴力。

West Bank 的人活在不确定与危险的环境下，其高等学府的命运也是如此。虽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施加的暴力没有停过，但是巴勒斯坦重新定义其自身的努力也未曾停歇。例如，在 Abu Dis 的 Al-Quds University 大学实行了一项特别的计划，称作 Campus in Camps，目的要把大学教育带入难民营中。此外，一个由 Alessandro Petti、Sandi Hilal、和 Munir Fasheh 等人发展的概念：“集体字典”，则由 15 位从难民营中来的青年男女所实践，问题化许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包括公民身份、参与、幸福、永续、知识、关系、公共等，并注入在地的新观念。这种 Freirean 式的教育为难民营的社会意识带来了转变，因为这里不再是逃难之地，而是一处政治空间。

如这期全球对话中 Feras Hammami 所言，例外状态也影响着宰制者。以色列政府就压制其大学内的异议教授。不过，以色列并非特例。Mustafa Attir 描述了 Gadhafi 政权下的社会学境况，以及新政府所带来的挑战。智利社会学家 Oriana Bernasconi，Alejandro Pelfine 和 Carolina Stefoni 则论述了民主转型的限制和矛盾，包括道德、环境、迁徙等面向。萧新煌分析台湾社会学的历史轨迹时也论及民主化，说明台湾社会学如何从进口美国理论与方法开始，到转向批判国民党威权体制，并在政治民主化中扮演一席之地。从另一个没那么乐观的立场出发，黄树仁对小规模的台湾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上述许多的限制并无法阻碍不断创新的社会学介入实践。如我们从 Jos é Soeiro 和 Dora Fonseca 的文章中所看到的，葡萄牙社会学家们发展出了反对搏节的新动员方式，许多点子是从拉丁美洲而来。Current Sociology 的主编 Elo í sa Mart í n 叙述了全球北方学术规范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葡萄牙的年轻学者则把关怀放在相反地地方：另辟蹊径，重新定义社会学，挑战第三波市场化所带来的毁灭性政治侵袭！

全球对话以 14 种语言刊出。请到 ISA 网站上可阅读全文。
投稿请寄给：burawoy@berkeley.edu



André Béteille 是印度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讨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并说明社会学如何在政策中保持批判的自主性。



Jacklyn Cock 是女性主义者、环境运动者、也是批判思考者。他分析了一种普遍但是缓慢的暴力形式是，不仅在南非上演，也是社会学的核心主题。



Sari Hanafi 访谈利比亚社会学家 Mustafa Attir。他描述了在 Gadhafi 独裁下的社会学以及新政府下所要面对的挑战。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伦,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庆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Saghar Bozorgi, Zohreh Sorooshf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Shohei Ogawa, Tomoyuki Ide,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Krzysztof Guba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üller, Tomasz Piątek,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Justyna Witkowska, Zofia Włodarczy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s, Ileana Cinziana Surdu.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Ekaterina Moskaleva and Julia Martinavichene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媒体顾问: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面对不平等的世界

2

社会学作为志业: 实用主义的观点

by André Béteille, 印度

4

社会学作为志业: 慢暴力

by Jacklyn Cock, 南非

6

> 中东政治

独裁统治下的利比亚社会学

An Interview with Mustafa Attir, 利比亚

8

以色列大学的政治危机

by Feras Hammami, 瑞典

11

> 葡萄牙回应政治危机

压迫者剧场: 新的公共社会学?

by José Soeiro, 葡萄牙

13

不变的危险

by Dora Fonseca, 葡萄牙

15

流沙中的社会学

by Maria Luísa Quaresma, 葡萄牙

17

> 台湾社会学

台湾社会学的三波转向

by 萧新煌, 台湾

19

小国社会学的困境

by 黄树仁, 台湾

21

> 智利的民主化

智利的道德议题与个人自由

by Oriana Bernasc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智利

23

智利环境政治的局限

by Alejandro Pelfini, 智利

24

智利Santiago的移民

by Carolina Stefoni, 智利

26

> 国家与国际

国际化社会学的挑战

by Eloísa Martín, 巴西

28

美国社会学衰落中?

by Bronwen Lichtenstein, 美国

30

> 会议

巴尔干化之外的巴尔干岛

by Svetla Koleva, 保加利亚

32

跨学科性

by Clarence M. Batan, 菲律宾

34

社会学和社会转型

by Leslie Lopez, 菲律宾

36

全球运动与在地愤怒

by Benjamín Tejerina, 西班牙

37

> 特辑

联合国的青年参与

by Jovanni Rodriguez, 美国

38

影像社会学: 真实的Bedik

by Eryn Snyder, 美国

39

> 社会学作为志业

实用主义的角度

by André Béteille, Delhi University, 印度



André Béteille 被称为是印度“最有智慧的人”，非常理性。他最经典的著作：“卡司特、阶级、权力”把韦伯社会学带入了人类学的村庄中。他的著作包括了不平等和其他各种公共议题。他也得过了许多奖项，并且担任过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会长。后来他从总理的国家知识委员会一职退休，期间推动以卡司特为基础的保留地区。他同时也是一位公共社会学家，有着很好的专业为后盾，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言论，以社会学的立场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意见发表看法，提出批判。

André Béteille，近期于Delhi摄。

社会学作为志业，必须要求学者去维护这个学科的专业性，同时若我们要追求社会学作为志业，而不仅是职业，则光是强调技术是不够的。不过技术还是很重要。总之，社会学作为专业学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很大的体系，透过各种概念结合在一起，包括方法和理论，提供了社会学家很充足的研究资源。

社会学必须和常识做出区分。常识通常有限，并且许多预设都未经检验。所以社会学虽然不该鄙视常识，但是要更深地去分析社会的肌理运作。社会学会

比像是物理或是分子生物学等更难和常识做出区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社会学和一般的常识与报导并不相同。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有3个特征：(1)这是一门经验科学；(2)这是体系化的知识；(3)这是一门比较的学科。作为经验科学，社会学要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中做出清楚的区别，在实然和应然中区隔开来。可以确定的是社会的研究当然包括价值和伦理，但是社会学研究规范是从叙述的角度，而非诊断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要建立系统化的方法的知识，去分析这个社会的各种

>>

连结关系。最后，社会学要透过比较的方法去分析社会，研究者从自身的社会出发、比较其他的社会。

同样地，我也用比较方法，并且质疑那些认为印度可以有自己的社会学并且完全摆脱西方世界的见解；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的确来自于欧洲和美国，包含了许多有问题的预设，所以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框架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上这随着时间变化，而且我也写讨论不平等议题的专书，希望让大众可以阅读。

在长期的教学经验里面，我长期在主要的学术机构之中。和其他同事一样，我总是要在“社会学理论”和“印度社会学”之间取得平衡。在理论课，我教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莫顿等；在印度社会学课，我教村落、卡司特、联合家庭等。所以很自然地学生总是觉得这两个课程没什么关联。

我的教学生涯中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学推论”的概念。在解释与定义社会学之后，我会讨论这种议题。通常会从政治议题开始，像是“政治作为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毕竟，政治对许多人来说是密切相关的。我问的主要是社会学是否有一种独特看待政治的视角。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宗教。宗教在印度吸引了广大的神学与哲学的研究，且早于社会学。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学可以带来更新的方式去理解宗教吗？一样，我们也可以问家庭、亲属、婚姻、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主题。

我已经用社会学的角度从事提问与研究，并把结果带给公众。我的想法是社会学应该为自己的专业而著述，但这不

是唯一目的。社会学家也有接触公众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发表论文之外，我也编辑报纸文章，像是 The Times of India, The Hindu 和 The Telegraph 等。虽然我为报纸写文章，不过我也避免像是记者报导一样表面地评论。反之，我以更广的历史或社会观点去诠释社会现象。

我的看法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不是伦理学家。我的兴趣是比较社会不平等。不平等是一个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问题。印度知识分子喜欢不平等的善恶两面道德化，可是不平等不会就此绝迹。我已经投入许多的时间精力去理解各种不平等的面向与其结果，如何转变、弱化、强化某些制度。我想我还是要维持这个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处理平等与不平等的议题，并且反对乌托邦或是命定论的思想，因为这两种思维不过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

> 社会学作为志业

慢暴力的危害

by Jacklyn Cock,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南非



没有社会学家比Jackie Cock更投入社会实践了。他是南非社会学的先驱。持续研究暴力与不平等的关系。从她经典的研究Maids and Madams, 家务工作的女性主义分析, 到Colonels and Cadres, 性别和战争的检视, 以及The War Against Ourselves所揭露的环境不正义, 我们看到Jackie Cock用社会学处理了广泛的不正义议题。

Jacklyn Cock再南非的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主持会议。

社会结构和过程形构着我们的经验, 不过总是隐微地、并且被传统的思想、掌权者的利益、官方说法等蒙蔽着。其中一个最危险的就是暴力总是被理解成事件或是行动, 是可见的。可是对人类最有害的却是“慢暴力”。Rob Nixon所说的“慢性死亡”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逐渐发生的暴力, 不可见, 却穿透时间与空间存在着。这种暴力通常不被认为是暴力。环境污染和营养不良就是这种慢暴力的展现。这样的例子都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但都深深危害着人类。

食物有关的议题包括了: 不平等、气候变迁、全球化、饥饿、商品化、都市化、健康。食物并非总是被认为和暴力有关。只有在除了和食物有关的社会抗议包发时(2008年世界各地30多个城市)才会被联想在一起。可是营养不良总是以“慢暴力”的型态出现, 因为这影响深远, 却不可见, 慢慢地侵蚀着人体。最有力的证据是全世界有10亿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南非, 每4个6岁以下的小孩就有1个是因为营养缺乏而发育不良。

此外, “食物不安全”的概念太过于

>>

空泛和冲向，让饥饿和营养不良之间的界线变模糊了。传统媒体总是传播着在索马利亚的残骸和干旱的难民形象，但是食物不安全一点也不能解释什么，甚至会隐藏许多讯息。营想不良时常和都市贫穷人口的肥胖连在一起，这些人依赖廉价食物，含有高卡洛里，但营养缺乏。这些现象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二氧化碳以及所导致的气候变迁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例子。这个污染持续影响着南非的穷人。许多这些污染以“慢暴力”的方式进行着，持续且不可见。那些广泛的影响巨大地污染生态，带来灾难。Bhopal 和 Chernobyl 就是慢暴力最好的例子。

靠近 Johannesburg 的 Steel Valley 里面，钢铁工厂的污染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缓慢但是持续。这个“慢暴力”穿透力相当强，把有毒物质渗透到土地各个角落，缓慢地透过空气和地下水，造成各种疾病、基因损害、癌症，危害动物与人类。

许多的污染，包括身体和河流等，都是隐藏的，无论从感知和理解上来说都是如此。这些污染以不可见的方式让大众暴露其下。像是 Ulrich Beck 所说的“社会认可”就是社会学的任务，特别是在 Steel Valley 的例子就是如此，污染对人类的为些总是被藏起来了。而那些钢铁工厂的管理者，和那些无在乎又无能的政府官僚一起狼狈为奸，企图卸责。

但是社会学对于人类解放的潜力远超出“暴露在解释之下”以外。上述两个“慢暴力”的例子都有其根源与后果。环境污染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环境成本的外部化，导因于企业的权力；而在营养不良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食物体系的运作来自于金钱诱因而非人类需要。

“慢暴力”并非无视阶级。穷人最容易遭受慢暴力的冲击，包括营养失调与环境污染。他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必须面对这种挣扎的处境。但是个体经验如何被更广泛的社会过程所影响正是 C. Wright Mills 的主要关怀和影响。所谓“社会学想象”意味着社会学家和常民一起在真实世界中实做（而且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取得营养时食物和干净的水）。

Michael Burawoy 把这种行动理论化为 2 种方式：“延伸个案法”和“公共社会学”。前者包括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理性、尊重、反身的方式。社会学必须把知识延伸到那些被研究者上，不论从上、从下，社会过程可以被观察和严谨的被分析。同样，“有机公共社会学”也让“可见变成不可见”，然后更紧密的和“可见、深厚、行动、反面的公众”结合。这包括了要去强调集体通作和拒绝 C. Wright Mills 所描述的“保护学者的隐私”。在这个高度个体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社会学要和贫穷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

如此一来，社会学可以强化社会运动，动员集体行动，处理像是“食物主权”或是“环境正义”的议题。这些运动都和社会正义有关，挑战企业权力和要求建立各种落实人类解放的社会制度。■

> 独裁期间与之后的 利比亚社会学

访谈Mustafa Attir



Mustafa Attir, 一位在独裁统治下存活的社会学家。

Dr. Mustafa O. Attir (以下简称 MA) 是 University of Tripoli 的社会学教授, 永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也是阿拉伯社会学会的前会长。其著作主题包括了利比亚社会的现代化影响。他接受了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的社会学教授, ISA 执行委员, 2011-2014, 以下简称 SH) 的访谈。

SH: 可以请你告诉我们你在利比亚的学术轨迹吗?

MA: 我在 University of Libya 的博雅学院拿到社会学学士。1962 年, 我学校送我到美国念书, 然后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拿到硕士, 在 1972 年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拿到社会学博士。后来回到利比亚教书, 也担任许多职位, 包括了博雅学院院长, 大学研究中心执行长, 以及校长。

SH: 我出席了一个阿拉伯研究中心的会议, 其中许多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批评 NATO 干预利比亚, 你的立场为何?

MA: 阿拉伯之春最早就在 2011 年 2 月 17 日的利比亚开始的。起初是一个在 Benghazi 东边的一个和平抗议活动, 可是政

>>

府用武力强硬响应。不过，政府过度强硬的暴力举动并没有冷却抗议的热潮，反而蔓延到全国，最后像是全民的革命一般席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控制了北边，但是其他东部、西部、南部还是在反抗军的掌握中。后来开始陷入内战，Gaddhafi 的武力远超过民兵部队。媒体让西方世界知道 Gaddhafi 的暴力镇压举动。很快的联合国安理会就通过决议要在利比亚上空建立禁航区，尽一切可能防止对民兵的攻击。这个决议因此也让 NATO 介入，禁止空军和海军，保留地面部队给反抗军。246 天之后战争结束。若没有国际的支持，按照 Gaddhafi 的无情，利比亚的人民可能从此不见天日。

SH: 你如何在独裁政府底下生产社会学知识呢？你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

MA: 在利比亚教社会学并不容易。独立设计课程，然后保持内容的不受意识形态打压也很不容易。我在美国受教育，深受经验研究和量化的影响，并且很关系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这些议题对利比亚来说和阿拉伯其他国家是很有关系的。利比亚人口不多，划分成很多部落，又彼此紧密相连。而我因为金钱资源充足，又是第一个社会学博士，要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或是申请研究经费，我没什么困难。为了避免找上麻烦，我不碰宗教和政治两项议题。不过我研究犯人，特别是那些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阿拉伯阿富汗人。虽然政府提供资金研究，不过要把研究发现落实到政策上并不容易，因为学术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弱。

SH: 利比亚的大学有政治肃清那些和 Gaddhafi 政府走得很近的知识分子吗？

MA: 利比亚的大学教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 1969 年 Gaddhafi 政变前拿到学位的杰出学生，多数在西方国家受教育（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些人献身

专业，投入教育。第二种是在 Gaddhafi 意识形态下的学生。那时是一党专政，虽然学生多少加入一些政治团体，不过 Gaddhafi 要大家遵从他的意识形态，多数也照做了。1976 年他命令那些服从他意识形态的学生去扫除那些所谓的反动派学生，于是冲突一触而发，受伤和被逮捕的学生不在少数，有的更被迫退学。后来他要组织那些追随者加入革命委员会。成员都要背诵 Gaddhafi 的言论，唯命是从。其中还包括把学生吊在校园内。

按照校规，其实只有杰出学生才可以出国念书。但是从 70 年代开始，那些加入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可以出国。这些人多半不是真的想念书，所以多数不能到好学校，只拿到三、四流的学位，可能在东欧或是其他阿拉伯学校。最后回来教书的话，也是宣传 Gaddhafi 的意识形态。所以利比亚的大学重新开放后，有些老师离开、被迫走人，可以留下的就是和政权有良好关系的人。家族和宗族关系可以胜过于法律。这一向如此，接下来也还会一样。

SH: 在利比亚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重要吗？

MA: 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当反抗爆发时，会不会成为革命都是未知数。知识分子用现代科技带动了革命。不过，在 2 月 17 日是突尼西亚起义。这和 Benghazi 于 2006 发生屠杀事件是同一天。在 2011 年以前人民也会抗议，不过数量不多，也很容易就被警察驱散。年轻人在 2011 年于 Facebook 上讨论和策划抗议行动，政府也都知道。只是后来在突尼西亚和埃及的经验鼓舞了利比亚更多的人加入抗议行列，即使在 Benghazi 的 Tripoli 和其他城市的人也都准备参加，政府暴力镇压也激怒了更多的人。抗议持续进行，年长者也加入了。后来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政治改变唯有从政府本身开始才有可能。

SH: 作为社会学家，你如何看待利比亚的未来？

MA: 在革命期间的口号是推翻政府、Gaddhafi 下台，建立民主。你不可能忘记一项事实：12% 的人口在 Gaddhafi 的掌权时出生。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被教导利比亚当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没有政党、选举、代议士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媒体都被政府控制，用来宣传独裁思想，目的在洗脑。利比亚反抗军成功改变了整个体制，推翻了 Gaddhafi，但我不认为民主就此到来。临时政府有各种媒体、政党、选举等，但是反抗军还没有解除武装。所以军队派系林立。所以各个武装部队可以自行决定逮捕、审问、囚禁人民。此外，这个国家还有很多极端宗教分子。只要这些团体还是和法律冲突，民主仍是缘木求鱼。

SH: 利比亚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学任务为何？

MA: 今日许多议题的研究已经解禁了。有需多资料可以用来建立新的理论，包括了和政府相关的许多变数。同时，阿拉伯之春也带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深深影响利比亚社会的未来，包括媒体、新的政治人物、国际关系、伊斯兰团体等。社会学得任务逝去描述这些不同与冲突如何影响利比亚。我深信利比亚社会学前途相当光明！ ■

> 以色列的大学政治危机

by Feras Hammami,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Stockholm, 瑞典



以色列高压管控其大学的教学与研究

以色列的大学人员最近发起了一项抗议，主要针对以色列国会高等教育委员会(CHE)所提出的禁止 Ben-Gurion University (BGU) 的政治系于 2013-14 年招收新生的法案。在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任职的 Gilad Haran 教授发起了这个请愿案，认为“以色列的学术自由遭受到空前的危机”。当请愿案在 9 月开始联署时，以色列政府开始进行言论审查。这是以色列从 1948 年建国以来的头一遭。这一天也代表了巴勒斯坦的 Nakba (Catastrophe)，也是巴勒斯坦历史上被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种族清洗、被迫迁离、家破人亡的一

天。超过 27 个以色列的大学当时支持种族隔离，并直接参与政治和军事的行动 (Hever, 2009)。

> 以色列政治反对的停滞

Benjamin Netanyahu 的右翼政府禁止了一系列的镇压手段去管制以色列的人权团体、媒体、以及法律的批判言论 (Cook, 2012: 22)。以色列学生和教师们一起监督学术环境，在一些“异议”教授的课堂上当起看门人的角色。为了避免政府找上门、丢掉工作、坐牢、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师生一起自我审查并禁止某些会激怒政府的言论。在 Bar-Ilan 的 Ariella Azoulay 就因为她的

政治结社行为而无法获得终身职。当 BGU 的 Neve Gordon 教授在 2009 年表达其支持对以色列大学的杯葛，一个国会外的团体 Im Tirtzu 就要求该大学把该教授解聘，要“终结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仇恨” (Haaretz, 9/30/2012)。教育部长 Gideon Saar 也批评 BGU 的政治系有“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见。Ilan Pappé 教授则因为在 Haifa University 支持杯葛，后来接到了许多死亡威胁，然后被 Knesset 批评，后来只好于 2008 年到 University of Exeter 任教。

Nizar Hassan 是许多得奖电影的导演，他也被 Knesset 教育委员会猛烈批评，只因为他曾经批判犹

太学生穿着军服在 Negev 的 Sapir College 上课 (Cook, 2008)。可是在该校, Bedouin 的女性学生在课堂上被要求脱掉头巾, 却没有人觉得不妥。自从 2000 年在 Intifada 的驱逐行动之后, 以色列警方和秘密警察就大肆逮捕和审问在大学内的巴勒斯坦学生。Yusef 是 University of Ben-Gurion 的学生, 就因为参加校内阿拉伯学生组织, 被警察逮捕, 最后丧生 (Gordon, 2006: 194-5)。

➤ 援助军事占领

以色列的大学支持军事研究和训练, 并和武器制造公司 Elbit 和 RAFAEL 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军火公司提供 Israeli Apartheid Wall 一套监控系统, 具有 760 公里长, 延伸进以色列在 West Bank 的占领区, 好让以色列政府可以兼并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Technion University 就是被 Elbit 的资金所援助的, 好让其公司的自动武器系统, 像是无人飞机等可以帮助以色列在 2008-2009 年可以攻击 Gaza 走廊。他也提供给该校参与攻击行动的学生特别的资助。根据 Hever (2009), Haim Russo 是一位 Elbit 的 El-Op 分部的经理, 就担任 Technion University 理事, 而且 Elbit 的董事长也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

许多以色列的大学被盖在巴勒斯坦村落废墟的上面。这些废墟是 1948-1967 年被毁灭的。Tel-Aviv University 从未承认他们是建造在 Sheikh Muwanis 村的废墟上 (居民被迫迁徙和流离失所)。其他大学, 像是 Ariel University Center of Samaria 就是建立在违

反国际法的 West Bank 屯垦区上。虽然 Ariel College 被以色列和国际人士所抗议, 教育部长还是将该校升格成大学。

这些例子显示出了关闭 BGU 的政治系有其政治动机。就像 BGU 校长 Rivka Carmi 写给以色列各研究大学的校长的信中说的:

“有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在威胁着以色列的学术环境…这不只是 BGU 的个别战役而已, 而是全以色列大学的共同抗战…CHE 目前核准的决定就像是在以色列学术殿堂上盖上一块黑布。” Tel-Aviv University 的 Tanya Reinhart 说: “历史上从来没有大学像这次一样决议关闭巴勒斯坦的大学。这完全违反了人权和道德, 而且大学居然选择和政府站在一起从事压迫行为” (Reinhart, 2004)。这对于那些以色列的海外支持者同样适用。在 450 所谴责杯葛法案的美国学院中, 没有任何一所反对 Gaza 伊斯兰大学被破坏的行为 (Gordon and Halper, 2008)。

为了响应这些违反人权的作为, 世界各地的学术单位要求大学落实宪法中所保障的族群政策。其中巴勒斯坦大学的英国委员会、瑞典的 “Action Group at KTH for the Boycott of Israel”、McGill University 的教职员组织、Berkeley 学生会等等已经要求他们的大学和那些支持以色列种族隔离的大学断绝关系。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是第一个终止与 BGU 合作的大学。在欧洲, 260 所学校, 20 个不同的国家要求欧洲委员会要将那些违反人权的以色列公司移出欧盟之外。

杯葛以色列的行动似乎传达出了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意志。不过, 过去 70 年来和以色列政府的交涉从来没有促进和平, 也没有让以色列更遵守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例子其实可以看出学术自由的力量。如此的诉求可能可以揭露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政策真相, 挑战箝制学术自由的监控网络, 并从政治和族群危机中将以色列的大学拯救出来。■

References

- Cook, J. (2012) “The full story behind the war against free speech in Israel’s universities.”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Accessed on 10/27/2012 from <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full-story-behind-war-against-free-speech-israels-universities/11783>
- Cook, J. (2008) “Academic Freedom? Not for Arabs in Israel.” CounterPunch. Accessed on 8/11/2012 from <http://www.counterpunch.org/.../academic-freedom-not-for-arabs-in-israel/>
- Egeiq, A. (2012) “Epilogue.” Omrim Yeshna Eretz - Hekayat Balad (Once upon a Land) / A Tour Guide. Sedek. Zochrot: Tel-Aviv.
- Gordon, N. and Halper, J. (2008) “Where’s the academic outrage over the bombing of a university in Gaza?” CounterPunch from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08/12/31/where-s-the-academic-outrage-over-the-bombing-of-a-university-in-gaza/>
- Hever, S. (2009) “The Economy of the Occupation - A Socioeconomic Bulletin.” Jerusalem: The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on 2010-02-05 from http://usacbi.files.wordpress.com/2009/11/economy_of_the_occupation_23-24.pdf
- Reinhart, T. (2004) “Academic Boycott: In Support of Paris VI.”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 被压迫者剧场

一个公共社会学的方式

by José Soeiro,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 (Students for Loans) 计划于2010年5月举行了论坛剧场，地点在葡萄牙国会的Senate Room。约2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参与，想出不论是立法的或是其他的解决办法。他们在葡萄牙国王King D. Luís的画像下演出。Carla Luís摄。

我们在2012年6月于Porto举行的葡萄牙社会学会议中设置了一场“论坛剧场”，叫做“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 (“Students for Loans” 反对 “Loans for Students”，<http://estudantesporemprestimo.wordpress.com/>)。我们演出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一名学生因为没有奖学金，然后被迫要跟银行借贷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个“被压迫者剧场”计划是从2年多前开始的，已经在许多学校演出过。

很多辩论和行动都由此开展，许多法案也从此延伸而来。这出剧目描述教育的成本，戏剧化地呈现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公共支出的删减，以及就学贷款的普及，让年轻人把未来借贷给金融体系。

看过之后，我们承认问题，指出症结，然后开怀大笑。观众也开始热烈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问题的根源。观众被一个角色 Joker 邀请进去戏剧之中，然后进行可能的问题

解决方案，看看他们可以作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有蛮多人接受了这个挑战。

> 当被压迫者剧场和社会学相遇

论坛剧场是压迫者剧场(TO)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这也是一种剧场政治的方法，由 Brazilian Augusto Boal 所发明，然后在许多国家中都被实践过。在葡萄牙的许多小区团体已经采用这种形式去思考其小区可能会面临的困难。这个出发点是一个非常民主假设：人类不是动物，有一种普遍的能力，即有能力去观察自身的行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演戏，都可以成为演员！1 无论我们即使是在另一个美学的空间中再现真实，我们成为行动者，决定我们所创造的真实。同时，我们也从当观众中获得许多回馈。

在 TO 里面，spect-actors (Boal 发明的概念，意味着同时是观众 spectator 也是演员 actor) 被邀请去打破舞台和观众之间的藩篱，观看者和被观看者成为一体。这种传统的二分方式可以在许多思潮中发现，挑战既有世界的正当性，

>>

也在剧场内外中进行批判。没有人被限制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之内。而去扮演其他角色的能力就是解放的最佳证明。

这是这场社会学会议的意外插曲吗？或是刚好相反，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辩论和介入呢？而TO和公共社会学的关系又是什么？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学到什么？而困难又在哪？

社会学技艺和剧场一样，是一种对现实的象征性生产，也是再现和理解范畴的制造过程。两者都和其他的学科、政治人物、媒体等一起竞逐去再现这个世界。论坛剧场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叙事，也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论坛剧场总是可以呈现故事的不同面貌去作为互动的框架。而其中一项很大的挑战是如何去如何让结构性元素更加明显地表达在论坛论战中，也就是 Erving Goffman 所谓的互动秩序。社会学在这点可以帮得上忙。社会学已经发展出许多重要再现的方法。透过观念元素，在真实世界中并不能立即辨识出来的观念，去再现社会。这些当然在剧场中相当有用，因为剧场中系统性的特征和结构通常不太可见。在另一个层次，社会学也研究社会关系如何透过实作呈现，然后角色如何体现在社会之中。社会学可能会去挑战剧场要思考如何让角色、认同、行动、身体等呈现出被社会关系和权力所结构化。最后，社会学并不习惯去把个体故事和叙事视为不可化约的整体，而是着重在其表达出来的关系。TO 称之为 *ascesis*，就

是一个我们把个体叙事粉碎化后，让现象变成律则的过程。这就是社会学推论的基本方式。

公共社会学的媒介或是挑战？

同样地，TO 或许可以成为公共社会学强大的媒介。作为更完整的人类语言，剧场可以把复杂度、脉络、机制、互动等概念带入社会如何被身体和空间所镶嵌的辩论中。最立即的一个方式是这可以把讨论带入经验中，所谓的 Pierre Bourdieu 的“务实理性”，去避免抽象的符码，特别是对那些并不熟悉社会学语言的人。因为论坛剧场是在所谓存在与不存在（可以被 *spect-actor* 再现）的空间中展开，所以可以邀请我们去批判性地思考社会真实，以及其他可能性。在TO里面，被压迫者在从属和反抗中存有着，每个一身体同时是宰制和解放的载体，而每一个重复动作同时也是行动的再生产和衍生的机会所在。

最后，TO 是互动是的。用 Brecht 的话来说，TO 可以同时是“启发性与娱乐性的”，也让公共社会学可以触及到更广大的公众。对于观众来说，虽然社会学的讨论并非立即的，但是这是一种邀请，观众被应请去观看剧场，其可能比去参加辩论来得更令人兴奋。这种方式至少也是一种经验，呼应 *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比起之前传统教育的方式去散播知识，剧场论坛可以召唤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剧场不是装饰或是表演而已，它是一种对年轻人的召唤，

召唤那些对其他形式辩论有兴趣的人的参与。

当然，受压迫者剧场作为公共社会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TO 的核心其实是“去专业化”。这点和社会学兼容吗？即使如 Burawoy 所说得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去沟通知识？若公共社会学的任务是比揭露真相要更激进地在公共空间中去实践社会学专业，我们怎么处理 Jacques Rancière 所说的“永远的丑闻”：民主是把平等当作目标，而非默认？换言之，公共社会学怎么宣称在专业思考和常识之间的地位差别？又同时怎么去接受TO的民主预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力和机会去发言？公共社会学可以忽略知识建构民主化，然后只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普及吗？可以让社会学知识成为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所言的常识吗？这些目标可以在不放弃社会学学科预设的前提下达成吗？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试了才知道！■

> 危险却僵化

葡萄牙的新社会运动

by Dora Fonseca,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无产阶级的抗争：标语写道“唯有抗争可以战胜危险，撙节不是出路！”

15

在欧洲地区日渐升高的危机已经带来了许多政府与社会的反弹声浪。过去的公民社会有着很强大的能力去产生新的集体行动者，去对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威胁。而后面这几年中，我们会发现这波抗争政治有其周期性，并且让我们质疑这种民主的正当性，唤起其他的议题，特别是劳工的危险处境。福利国

家和其目标的重建已经变成了共同的关怀焦点，也促成了新的集体行动者和旧行动者的转变。

> 僵化的危险

葡萄牙所谓“僵化的危险” (Precários Inflexíveis, PI) 就是这样的行动者。这项运动首先于2007年在首都Lisbon诞生，目标是继续May Day游行的成功动

员。开创PI的集体行动者是一种填补既有社会运动空缺的方式，继续讨论劳工的危险处境与其社会影响。PI从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展开。这个行动叫做Ferve，反对独立工作的误用。Ferve也支持fartos d'estes recibos verdes，这句话可以被翻译成“fed up with these green receipts”，green receipts的意思是独立工作状态，只那些和雇主没有形

>>

式的从属关系。法律上，这些劳工就是自己的老板，并且预设着他们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不过，事实上他们都是从属于其雇主的劳工，赚取薪水，并且无法享受应得的社会利益。PI 在 Ferve 上建立起来，不只强调“green receipts”，也讨论各种形式的劳工危险。

PI 的创立和发展是遵循着 Sidney Tarrow 所谓定义的社会运动过程。第一，集体挑战者的集结；第二，利用社会网络、共同目标、文化框架；第三，巩固认同，透过链接结构和集体认同去支持集体行动。集体诉求的提出在这里特别明显：谴责劳工危险，强调劳工面对的是不稳定的契约关系，并且重视个体生活的方案和职业。PI 也按照各种自主组织的倾向，迥异于传统的政党和工会。

PI 也呈现出了新社会运动的相似性格：很强的内部民主传统；分布式领导；很高比率的非正式性；利益的个殊性；依赖网络科技的使用；创新的公共行动；分散的组织结构；不和敌人谈判；团结作为目标；要求参与和直接行动。所以 PI 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网络科技的使用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网站：<http://www.precariosinflexiveis.org/> 是第一个 PI 成立的宣言。这个网站在他们发表“危险宣言”后马上成立。在此，他们积极地定义自身为“在工作 and 人生中暴露在危险中的一群人”。他们纪录所面临到的危险处境。这些处境遍布各个经济活动之中，特别是在公部门里面。此外他们也强调他们在政

治论述中的销声匿迹。他们宣称要重新唤起斗争，意味着传统工会的斗争模式不再适合于现代社会了。还有，他们认为其处于“危险却僵固”的泥沼里面，所以要反对一切的劳动危险与无产阶级化。

一开始的行动主要聚焦在谴责不公平和违法的工人处境。这意思是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临时的劳动契约。他们也面临到参与传统工会组织的困难。这并不是什么劳工运动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渐渐越来越多对于形式组织和制度政治的不信任所导致。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建立新的认同：“危险的劳工”。这一步是有效动员反对去管制化劳动处境的必要条件。因此，透过 PI 的存在，中心的目标在于召唤那些处于相对不利处境劳工的危险认知和意识。透过动员新的意义，连结劳动危险对于效率的伤害（结盟其他国家或国际的集体行动），如此可以开创新的争议和冲突的场域。他们一开始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去展示其特色，但是后来却演变成高度的工具化和形式化，所以 PI 后来也变成了一个正式组织。

＞寡头铁律？

今日，所谓的“僵固的危险”正历经着新的阶段，进入新的“生命周期”。作为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组织，PI 现在正在形式化和合法化。这个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转变是一个合理的步骤，主要是为了成为劳工阶级代表而取得正当性。有了合法的地位之后，

选举变成可能的选项，为其代表的广大劳动者发言，并且和其他的正式组织进行谈判和对话。

尽管这个新的可能性来自于正式的组织模式，有一项议题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寡头铁律。寡头铁律可能会为 PI 带来负面伤害，因为形式化的组织可能只会专注在组织结构的维系而忽略了组织目标的达成。从自发性的抗议到组织形成事实上已经让 PI 的有了转面，变得较为保守。但是，有许多学者指出，像是 Alberto Melucci，官僚化是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可逆的结果，也不必然让组织原本的激进目标受到影响。另一个可能的替代选项是下一个月将进入政治季节，新的欧盟撙节计划将会提出，也会有新的反对现况的社会运动出现。只有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影响，以及组织正式化之后的转变。

“僵固的危险”其实和寡头铁律是可以相互共存的。最佳的例证是看到在 2012 年 9 月 15 日的动员，成百上千的群众在街头上抗议，并且由非正式的网络所带起，反对撙节；或是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街抗议 13 年国家年度预算案的运动。他们反对最大的葡萄牙贸易联盟；此外，我们在 2012 年 11 月 14 日发生的总罢工运动中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共生性。■

> 流沙中的社会学

第7届葡萄牙社会学大会

by Maria Luísa Quaresma, University of Oporto, 葡萄牙



第7届葡萄牙社会学会议于2012年6月19-22日在Oporto University举行，由葡萄牙社会学会(APS)主办。APS于1985年成

立，这个组织向来支持葡萄牙的社会学发展与知识传递。而过去的独裁政府则把社会学视为是“不方便的学科”。1974独裁统治结束后，民主时代来

热情的新世代参加在Porto的葡萄牙社会学大会，2012年6月19-22日。

临，APS 的成立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从 80 年代末我们已经每 4 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将葡萄牙社会学社群齐聚一堂，并欢迎国外的学者一同共襄盛举。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社会，危机，重构”。这个主题很切合时代的氛围，因为正值经济与社会的动荡年代理，可预测性被不确定定性所取代，安全风险所取代，希望则被恐惧取代。各种形式与主题的多元性吸引了来自各地上千位的社会学家，包括了 669 为发表者。其中 72% 从葡萄牙而来。我们必须强调这次大会包括了很高比例的外国社会学家 (19%)，特别是巴西。

6 月 19 日会前会即展开，标志着年轻社会学家的创意。这个点子主要是组织与会者参与讨论社会学生涯职业的议题，包括了就业市场和其他的就业机会。第一个主题由 ISA 的

会长 Michael Burawoy 所主持，有 180 位青年社会学家出席。与传统会议模式不同的是，以往常见的阶层和距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 Michael Burawoy 对话”，并且从数个月前就由青年社会学家提出议题和问题。Burawoy 教授以科学知识的民主化、科学正当性被大型研究机构所垄断、社会学介入公共领域的可能等论点去响应学生的提问。

在接下来的 3 天会议中，“社会与政治”、“社会、民主、价值”、“危机和政治观点”等的全体场次吸引了许多公共人物和葡萄牙社会学家前来和公众互动。这些座谈场次辩论了学科最前沿的问题，并会科学知识生产和社会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搭起桥梁。国外和葡萄牙专家讨论了南欧的政策，如经济、工作、教育、健康、老化、社会安全、土

地与环境等，以及其后果。最后，我们还有许多主题场次，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组织与专业、教育社会学、艺术文化与沟通、城市、农场与土地、全球化、政治与公民身份。

知识计划的部份由广大的文化和娱乐企划所支持着的，包括了短片、学生剧场创作、音乐会 (Homeless Orchestra, 由 Casa da Música 所支持)、书展。为期 3 天的会议气氛在晚宴后达到最顶点。所以，辩论与讨论最后的结论是：葡萄牙社会学仍然生气蓬勃。然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看到了每一位社会学家都时时刻刻地在积极投入社会学这项志业，不曾停歇！



> 台湾社会学

三波转向

by 萧新煌，中研院社会所所长，前台湾社会学会理事长，台湾

回 顾过去，台湾社会学的历史有其独特性。虽然台湾在1895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可是日本的社会学并没有为台湾留下什么得以传承。此外，中华民国(1911-1945)在日本二战之后接管了台湾，其社会学传统也没有移植过来。所以，台湾社会学的诞生始于1960年代，深深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在1960到1980年间依赖美国社会学的走向。而后在1980年代，社会学的“本土化”展开，伴随着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运动，学者们开始反思过度依附美国社会科学典范的现象。从此，台湾社会学的知识地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一开始，台湾第二代社会学家开始形成一股自我批判的共识。而这些学者多数是留美的，他们认为，尽管大家努力要理论化台湾的个案，但是台湾社会学缺乏扎实的本土经验和脱离在地的现实。这些第二代学者诉求要“扎根”在镶嵌于台湾认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上。而后社会学者了解到了国民党威权统治是社会学健全发展的最大阻碍，所以随即展开了“自

由化运动”。他们呼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社会。这波自由化运动希望可以让社会学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从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学见证了“本土化”与“自由化”的双重经验，这不仅直接转变了台湾社会学的性格，也间接影响了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更确切一点，这股“本土化与自由化”的运动在过去几十年来有三波转向。第一波是“温和转向”，目标是精确捕捉台湾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变迁。一项重要的改变是“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于1984年开始展开。这项调查提供了非常高质量的数据数据。另外一个改变是出版了一系列的台湾社会问题分析书籍，迄今分别已在1979、1984、1991、2002、2005、2010等年度出版。这系列成为了非常可靠的学术与公众的参考书籍。

社会学的第二波转向是“批判的转向”，旨在投入重要的公共议题上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去挑战国民党的言论禁忌，从事三个领域的研究：族群和族群关系、社会阶级和阶

>>

级冲突、性别和性别不平等。因此，在 1980 到 2011 年所出版的 160 种编辑书籍、总共 1133 个章节中，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结构变迁等类似议题为最大宗 (214 个章节)；族群占第二 (131 个章节)；性别占第三 (78 个章节)。其他主要的研究计划还包括了公民社会中社会运动的缘起与实践。至今我们有 5 本重要的社会运动书籍，分别在 1989、2000、2006、2010、2011 年出版。

第三个转向是“激进的转向”，目的在让社会学于台湾民主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台湾社会学加在报章杂志上投稿，组织或参与公共会议或记者会，企图维护与增进台湾的民主价值。本质上，台湾的社会学从 1980 年开始就实践了公共社会学，并推动台湾民主化了。为数众多的台湾社会学家扮演起公共知识分子或是运动者的角色，直接投入发起、动

员、领导各种民主运动。

从 1980 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学和社会变迁的辩证关系，显示出了在台湾历经巨变的同时，社会学也展现了其强韧与旺盛的生命力。台湾社会与政治的转变让台湾社会学发展出了与台湾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鼓舞了社会学去挑战威权统治，投身批判性的研究，甚至直接参与民主运动。台湾社会学不仅是一门自由解放的学问，同时也促进了台湾的民主深化。■

> 小国社会学的困境

以台湾为例

by 黄树仁，国立台北大学，台湾

台湾在大约 60 年前，社会学的博士寥寥可数；而今日台湾的社会学已经成长为拥有约 300 名博士的规模了。台湾社会学不仅在学术上有大幅的进步，在公共政策上也贡献良多。此外，对于理解台湾这个快速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国家，台湾社会学也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台湾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也面临到了挑战。由于台湾的人口规模和学术资源决定了现今这个小型的学术社群规模，所以为社会学带来了限制。这个限制也很可能加诸在其他小国和其他社会科学上面。

今日的社会学就像其他学科一样，高度的专业化，被切割成好几个次领域，而每个次领域也包括了许多的研究主题。如此专业化的学科其实是需要好几年的理论与方法的训练，才可以使一位研究者针对一项议题从事有意义的研究。只有 300 名学者的学术社群意味着许多次领域只能找到很少的研究者。因此，许多议题长期以来被忽略了。

当台湾社会的诸多面向被忽略之后，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有许多空白模糊处，这也回过头来影响了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若没有足够的本土研究来提供给整

个社群去参考引用，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只能被迫依赖国外的学术资源。因此许多本土问题我们只好去用猜想的。如此一来许多关于重要的台湾社会面向知识多半是用猜的，而非经过扎实的学术研究。而学术作品的读者一般来说也无法区分什么是用猜的、什么是学术研究的成果。

即便是那些广受注意的次领域，其研究者也只有个位数而已。文章出版则不频繁且缓慢，若是不几十年一次，也要好几年才有文章出现。甚至在最受欢迎的领域中，通常也要等上好几年也可以看到文章被引用或评论。实质的对话有如梦境般的遥远。从事学术的孤独是常态；最杰出的研究者也常常会因为这种缺乏交流的情况而感到挫败沮丧。

更糟糕的是，对话的付诸阙如不利于文章质量的检视与校正。最极端的情况可能是有问题的文章却是长期以来本土的唯一作品，其内容可能只是一般的常识性论点，很容易产生误导。

当还有太多的主题没被好好研究或是被误解时，被研究最透彻的领域也可能受到波及。原因很简单，就是作研究不可能无中生有。我们总是以前面累积的知识为背景和基础去从事研究。唯有前

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数据的诠释和解读才得以可能。若这个知识的根基太过于薄弱、不稳，在怎么用功的研究者也会暴露在错误解读资料的风险下。易言之，这无关乎研究设计得好不好，资料全不全，分析得仔不仔细。只要前面累积的知识有所缺陷，后续的研究很难不继续出错。

此外，在地研究的缺乏也让原创性的观念和理论难以形成。但这对于分析本土社会的特殊性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每个社会多少都有其特殊性，并且很难被外来的理论观念所精确捕捉。在这个常见的情况下，为了理解自身所处得社会，除了本土数据之外，本土的概念与理论也是必要的。可是台湾很显然就是不够多的学者可以去从事这项工作。即使少数特别幸运的领域中有学者可以发展出原创性的本土理论，这些作品也很少被同侪学者所引用和注意。加上外国期刊的理论源源不绝的进口而来，其背后有着成百上千的学者背书，本土理论因此就更难在国内找到跟随者了。尽管“本土理论”听起来很时髦，可是现实上这个学术市场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规模、相互引用、信誉去支撑本土理论的

建构。结果就是台湾社会学变成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大家复制生产类似的研究，把本土数据用外来模型套用解释而已。

好，那我们除了悲观，还可以作些什么？我认为要去思考社会科学在各种公共政策里的相关性与价值，去审视因为知识缺乏而导致错误政策的社会代价，以及我们对于投资社会科学的责任所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成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是有限的，更积极努力地去累积更广泛的知识，并对于科学解释有更多的自我反思。■

> 智利的道德议题和个人自由

by Oriana Bernasc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所谓共同道德的概念并不精确；或者，并非一成不变”

(Seyla Benhabib, 2004)

智利在过去几十年来历经了健康、教育、福利、劳动市场等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确带来了更包容和平等的改变，不过要努力的地方还是很多，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像是个人自主、经济平等、政治参与、反歧视等，还有待解决。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是需要面对这些议题的，而社会科学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有助于帮我们处理那些社会争议，减少冷漠、误解、和不信任。

在智利，社会议题的争议包括了道德的面向，我们称之为“价值争议” (disputas valóricas)。公共辩论的议题围绕在安乐死、离婚、堕胎合法化、以及性少数等等。智利社会的许多争议议题都和法律有关，这是因为许多法案事实上都需要考虑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而这关乎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整个辩论是反映了善、公民、分配等的核心规范价值，此外还包括了道德规范的来源与程序。

在民主复苏之后，智利社会也开始关注不同的改革如何扩大个体自由和减少公共对于个体的干预。在多数西方国家，若堕胎等议题先发生、而后是安乐死的话，在智利则是于 1990 年代开始讨论性教育、为期长达 9 年的离婚法案辩论 (2004 年才通过)、以及 6 个规范如何“尊严地死亡”的法律、然后是安乐死 (2001-2012)。这些辩论至今仍持续进行着，并且聚焦在性少数和事后避孕药。社会一旦进行这些关于个体自由和反对歧视的辩论，其实就是展开政治议程的

辩论。但是智利的某些人将这种需求视为是成熟道德社会的表现。相反地，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道德衰败的象征。

我曾经重建了这些辩论的论述过程，聚焦在安乐死和尊严死亡等案例。这是一个充满法律与道德意含的辩论。近期的发展已经到了生物和生医的领域，开启了许多介入、操作、延长、改进人的生命的可能性，并且重新定义了生命本身。安乐死、试管婴儿、代理孕母等都让我们继续辩论这些社会与科技的争议，并且拥有类似的论述结构，以及相似的道德挑战。

这些辩论的分析反应出了两种道德原则的冲突：病患的自主和生命的不可侵犯。那些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病患处于极大痛苦和不可回朔的病痛中，是可以合理要求医生安乐死的。而反对者则在医疗脉络之外呼吁消极的安乐死以及不施加必要的医疗行为。但是这个辩论远远超出了去合理评价两种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以及法律对于真实情况的描述方式，像是死亡的本质和帮助自杀、一般或是额外的医疗行为等都没有被讨论到。所以，争议所包括的不只是公民价值的争辩，也是科技事实的社会政治建构过程。最后，这更是一个科学和道德相互交织而成的“晚现代性” (late modern times)。■

1 I interview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bioethicists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studied the legal proposals and their discussion in Parliament, and examined coverage in academic articles and newspapers.

> 智利环境政治的局限

by Alejandro Pelfi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LACSO-Argentina



在智利的Patagonia抗议水力发电水坝的兴建。

2011年智利突然之间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反对高学费和不平等教育的学生运动获得了大量的关注。更广泛而言，那一年的标志是社会运动和公民政治化的蔓延，反对被动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侵袭。这个新政治运动不只是学生运动，还是代表着各种典型社会议题的争议与分歧。原住民自主的权利以及

某些公共地区的保留等，都是环境的资产，也号召了许多其他公民的关心。

各种的抗议在地区蔓延开来，一直到首都 Santiago，反对在智利素负盛名的地方建立大规模的水坝 (Hidro Aysén)。大型的公民抗议运动也开始质疑环境政策的正当性，以其资源政策和相关的非永续经营政策。在这个意义

>>

上，智利是第一和最成功的新字由主义实验国家，成为了半边陲国家环境现代化的典范。

智利的环境政策不到10年。它从南太平洋的鲑鱼繁衍危机开始。本质上这是个自然反应，但主要的行动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政府并没有对后来的公共政纲做出贡献，反而是替之前投资开发计划背书。政策被当作是资源开发的正当性来源。鲑鱼繁衍，木材，矿产等是智利的主要出口品。这些是环境管理的目标，并且附带另外3项细节：资源保护（而非环绕于生态系统）；社会和环境之间冲突的控制；投资开发者利益的保护。环境政策因此着重在这些开发资源上，并且和3个主要行动者有关：投资者（通常是跨国企业）；

国家；专家（智库或是环境评估公司，提供科学正当性给开发方案）。这些行动者透过一个网络连系起来：精英之间的联合，主宰环境政治，而公民则沦为观察者。

我的计划是试图去分析这个网络怎么被巩固的。更大的脉络是主导论述（通常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起来的各种特权制度安排（自愿同意），以及利用环境评估指标去正当化与再生产其环境政策的主宰性格。总之在这个脉络之下，进步民主的理想，例如课责性、透明性、参与性等被化约成只是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分工的工具，如此去推广更弹性的拥有权和自我管制。集体学习开启了某些民主化的契机，但只是以“被监督的学习”的形式出现。所以，这里的

问题在于是否如此的限制是导因于化约的工具化，并被企业与精英联手主导？或是理想价值（课责性、透明性、参与性）等其实是不够进步与民主？更敏锐和积极的公民会把更有创意的问题带到公共领域中，把政治从既有制度泥沼中拉出来，带到街头上，吸引镁光灯。■

> 智利Santiago 的移民

by Carolina Stef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在智利Santiago服务秘鲁和哥伦比亚移民的超市。



Santiago 是智利的历史城市中心，也是最大的移民都市。此处有大量从拉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多数是秘鲁。这些秘鲁移民发展出了密集的商业活动，主要贩卖服务给国外游客，像是厨具，甜点，客服中心，货运，以及汇款服务。

在这个发展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因为居民持续的从市中心移走，所以有许多的老房屋，店面空出来。也因为这样，移民就因此聚集，把房间转租给人。此外，也有秘鲁产品公司的成立，让许多移民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另外像是在 Concertación 政府执政期间（中

>>

Santiago的购物中心成为移民的活动中心。



间偏左的联合政府)也让移民正规化,让他们可以进入正式的经济体系中。

在此我想要强调3个重点。第一,移民劳动和经济之中,正规和非正规的实作常常是重迭的。当政府企图要减少街头经济活动时,许多正规的商店还是照样进行非正规的交易,例如在街上贩卖,无契约工作,无照贩卖等等。这样的地下经济活动是一种增加收益的策略,导因于市场的高度竞争和低价获利。

第二,这个都市是移民社群的认同形构的参照点。这个空间在移民社群之间可是非常有名的。不论是对其他居民或是移民母国的社群来说皆是如此。这个城市是一个具有相同经验的外国人的会面地点。

第三点则和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有关,以及如何影响到了此地区的意义与型

态。事实上,Santiago作为历史都市的中心意味着种社会关系在此交会,像是工作、旅游、公共服务等。这样的社会网络交织出了Santiago的边界、意义、特色。

的确,移民在这个地理中心上的生活方式也带来的意义与再现,并且和其他的意义与再现之间是有紧张关系的。在此可以举2个例子。第一,这里其实是重要的都市地点,因为国家政府大楼、法务部、各个行政部会等皆位于此。这也是独立宣言诞生之地。所以,这样的历史与民主的重要性对外国人来说并非如此。

第二,这里也有一个全球都市的议题。这是一个更现代去再现Santiago的方式,也被市政府积极推广。这包括了去推行干净、安全、有秩序的都市形象,作为国际交易中心,并且利用警察去管理

监督都市中心。如此一来,移民就显得格格不入。

移民及这个空间带来了许多论述上的争辩与争议。但这些也正代表了这一个都市的特色所在。■

> 国际化社会学的挑战

by Eloísa Martí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Current Sociology 主编

最近全球高等教育制度有了一个共同的需求：国际化。为了达到此一目标，大家都想成为最前面的几名：努力发表到影响力指数很高的期刊。在过去 30 年来，这个目标被视为是学术的核心价值，而且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同时，发表到国外期刊被和发表到英语期刊划上等号。所以像是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德文等期刊都只有特定区域的读者，也不被认为是国际期刊。英文的优势，作为全球的学术语言，更是助长了这个潮流。

然而许多期刊只所以被标榜为“国际期刊”只是因为它们排名很前面，有很高的影响力指数，是用英语而已。但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国际！就像 Tom Dwyer 在 ISA 的 2009 年国家会议中指出的一样，事实上英语期刊一点也不等于国际期刊。¹ 北美或西欧的期刊关心发展国家的社会，这并不是坏事，可是问题在于那些全球南方的大学和机构要求其人员一定要发表在这些他们认为是国际的期刊上，这使得那些非主流的学者进退两难，结果就是使得许多社会学家身陷困境。

面对这个假的国际化需求，或许其本身有些重要性，可是这也深深影响刻划着我们这个学科。我想有 3 个可能的响应方式。第一，高度的在地主义，不论在国家或是地域的层次，学者都拒绝在国际场合发表。这有时表现在极度复杂的对于期刊评比系统的批判上，有时也表现在文化主义上，结果就是只发表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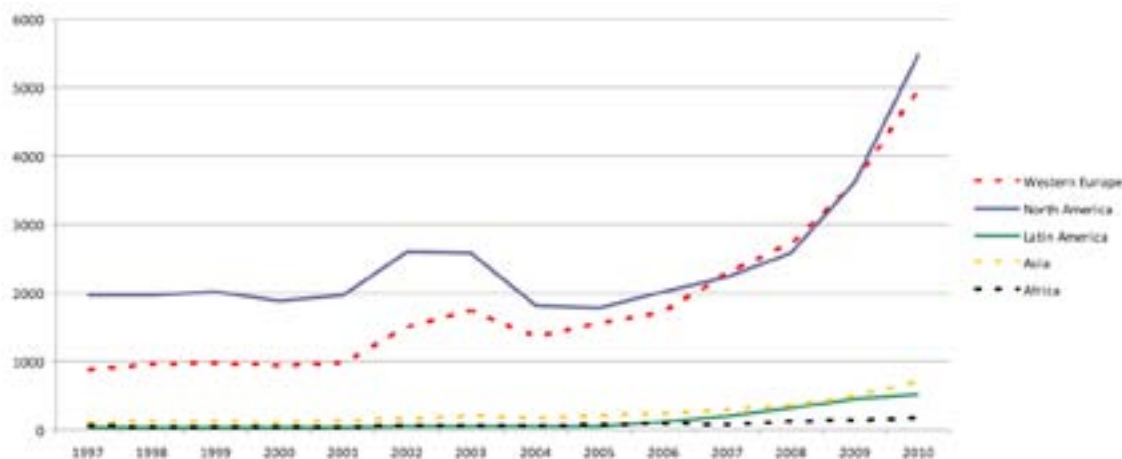
文章。这个特殊主义的优点在于可以深化某些特定问题的讨论；可是，坏的结果是无法和其他领域观点进行对话，进而窄化了知识的理论化潜力。

第二个响应是接受这个国际发表的压力，并且把此当作为一的学术目标。如此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非主流学者拼命吸收主流学者的问题、理论、方法，并且甚至模仿写作风格。奇特的是，非主流学者并非总是可以达到目标，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避开模仿的陷阱吧。写个完全学术味的文章会可是会使学者丧失原创性和切题性的！努力把在地的分析和主流理论结合和符合主流格式成为了“Procrustean bed”（译注：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床，若睡在上面的人高过于床身，把脚锯短；反之则把脚拉长）。

第三个回应是对话。作者、机构、期刊等会承认在地的特殊性对于学术问题、理论辩论、写作风格的重要性，并且同时可以把国际发表视为是各国社会学发展和茁壮的一扇门，也把这个机会视为是全球社会学知识社群的共同努力方向。这就是 Current Sociology 和 ISA 所希望的！

全球社会科学报告 (UNESCO, 2010: 153) 指出发表的国际化其实是对先进国家有利的：像是欧洲和美国。事实上，有超过 80% 的期刊是以英语发表，然后 2/3 是在以下这些国家的期刊上：美国、英国、荷兰、德国。同时，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只占了不到 5% (UN-

以作者的区域为划分的期刊发表分布。Source: SCOPUS



ESCO, 2010: 143-4)。

若我们观察在前几名的期刊 (SCOPUS), 我们可以看到多数作者来自于西欧和北美的学术机构, 亚洲和拉丁美洲则相当有限 (亚洲数量成长中), 然后非洲几乎是零。2

Current Sociology 也很难自外于这个潮流。从 1999 到 2009 年间, 72% 的文章是由欧美学者发表。3 这和其他主流期刊很像。亚洲和澳洲分别占了 8.1% 和 5.3%。此外, 超过半数的作者来自下来国家: 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

但是, 有个有趣的是: Current Sociology 发表了 6% 的拉美学者的文章, 3.2% 的非洲作者文章, 2% 的中东作者文章。我们离理想的数据还很远, 不过同时我们可以骄傲的说, Current Sociology 已经广开大门给非主流学术社群, 很努力的要达到内容和地理区位上的多元性。

Current Sociology 从 1952 年建立以来就一直朝着多元的目标迈进。这份期刊接受任何语言的研究计划, 同时这也是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政策。此外, 它也接受各种非主流的新的议题、理论、方法等, 而且还包括了写作格式的创新。这份期刊也致力于社群间的对话, 让在地的分析可以让更多国际上的读者接触到。的确, 在这过程中, 在地

的特殊性或许多少会流失, 不过分析的复杂度并不会。而和世界各地学者辩论的可能性也让 Current Sociology 的作者和读者皆能受惠! ■

1Dwyer's comments can be seen in the video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5GaEPQc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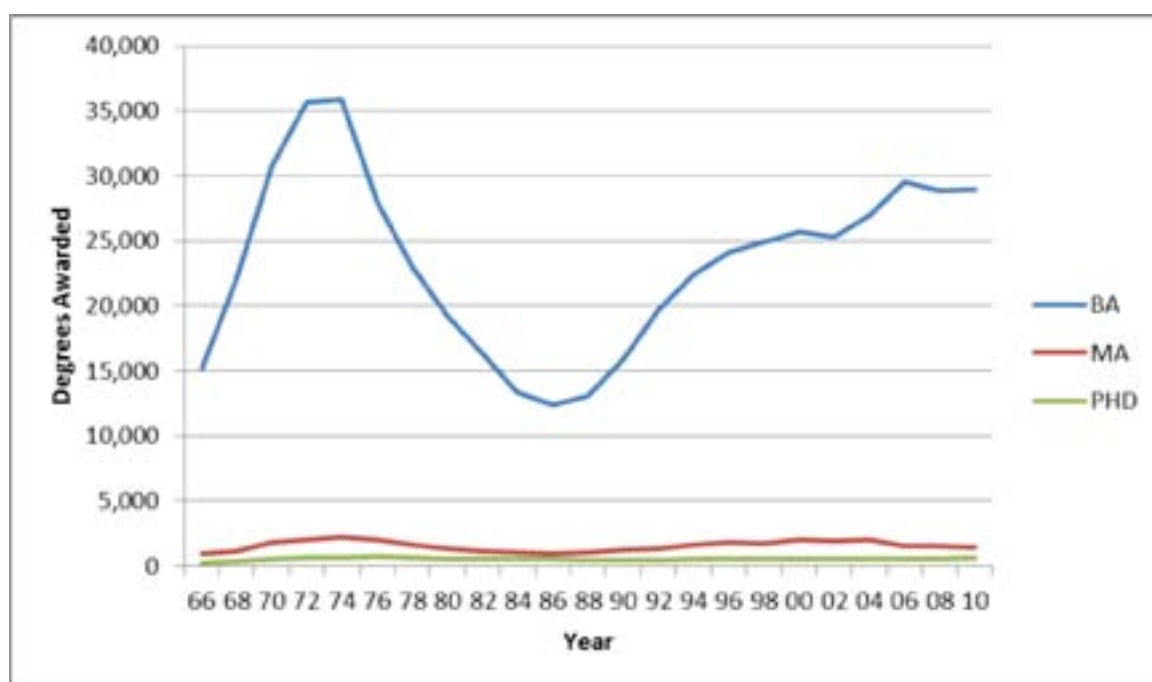
2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tías López, editorial assistant at Current Sociology, who came up with the data for this chart and created it.

3 More details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is survey of Current Sociology can be found in Eloísa Martín (2012) "Making Sociology Curr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 Collective Task." Current Sociology 60(6): 832-7.

> 美国社会学没落中？

by Bronwen Lichtenstein,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美国, RC49会长(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Sociology Degrees Awarded by Degree Level in the US, 1966-2010.
Source: ASA, Research on Sociology 2012.



美国社会学的现况是什么样子呢？1994年时，我刚从纽西兰移居到美国的Alabama。那时我就听说美国社会学正在没落中了。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的社会学博士班最近才被裁撤掉而已，而且教授和管理阶层为此起了很大的冲突。而社会学辅系也被并入犯罪学系，我现在可是在这个系教书。从这之后，重新恢复社会系的声音不见了，社会系的辅系也因为课程太少而难以支撑下去。从我的观点看来，美国社会学的确前途堪虑。

美国社会学前途为何？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不过直到我看了这

篇 Benjamin Ginsberg 的 2011 年的书：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他这样说道：“精确地说，这个命运[每况愈下]已经让许多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所岌岌可危，因为学生不再对社会学感兴趣了。”

Ginsberg 的命题让我去查询了美国社会学会 (ASA) 的网站，想知道美国大学社会系的走向。其指出，社会学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 1990 和 2004 年间成长了两倍。一项在 2001 和 2007 年的更新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成长还在持续着 (Spalter-Roth, 2008)。独立的社会系数

>>

量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因为学生人数成长的关系。

ASA 也指出了 3 个警告：首先，博士学位并没有和上述的成长同步，甚至在 2000 年代初期减少，而后才又稍微成长。第二，犯罪学的集中化导致了传统社会学的式微。第三，终身职教授的缺很少，但学生却增多。大学喜欢雇用临时或是全职的讲师，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考虑，但这大大影响了社会学这门学科 (Wilson, 2010)。

或许还有一丝曙光吧。ASA 的报告可以从美国社会学更广泛的趋势脉络下来理解：1970 年代其实是社会学系所成立的最顶峰阶段，全国的社会系所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是到了 1980 年代，社会学的学生人数学位量开始快速减少，许多人增预言那是社会学的末日 (Summers, 2003)。Dunlap 和 Catton (1994: 11) 把这个衰落归因给 80 年代的市场基本教义派抬头和里根政府对社会科学的“severe attacks”，这使得学生对社会学失去兴趣。这次的下滑相当多，社会学规模至今都还追不上美国的人口成长速度。

Ginsberg 所言之“学生对社会学失去兴趣”或许是对的。不过，我想还有其他的因素，那就是就业市场的极度不稳定。容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有一个趋势是大量授予专业而非学术的学位，这或许是经济而非意识形态的考虑。学生若想修社会学，他们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我之后可以作什么工作？”我总是回答：“噢，很多啊！”然后继续解释社会学为什么有用。但是，从我的社会学教学经验来说，连社会系都会被撤掉了，所以社会学有用在哪？嗯，我也想知道。

几年以前我调查了 1000 名的犯罪学系和社会系的大学生，问他们社会系是否应该存在于大学中，答案很明显是肯定的。所以，我想学生失去兴趣并非是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他像是父母认为商业、工程、医疗、教学等学位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可能更为关键。无论如何，社会学在 2012 年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或许不像其他专业学位一样可以让很多学生想拿到这个学位，不过传统社会学还是有其地位在，像是批判性思考，博雅知识，公民教育等。我对于美国社会走往功利主义的另一端这点而言，我可是很乐观的。■

Referenc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 “Research on Sociology: Sociology Degrees Awarded by Degree Level 1966-2010.”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12 (http://www.asanet.org/research/stats/degrees/degrees_level.cfm).
-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1994) “Struggling with Human Exemptionalism: The Rise,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5(1): 5-30.
- Ginsberg, B. (2011)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alter-Roth, R. (2008)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Department? A Comparison of Findings from the 2001 and the 2007 Department Survey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asanet.org/images/research/docs/pdf/Whats%20Happening%20in%20Your%20Dept.pdf>).
- Summers, J. H. (2003) “The End of Sociology?” *Boston Review* 28(6).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boston-review.net/BR28.6/contents.html>).
- Wilson, R. (2010) “Tenure, RIP: What the Vanishing Statu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enure-RIP/66114/>).

> 巴尔干化之外的 巴尔干岛

by Svetla Kolev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and Knowledge, Sofia,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社会学会会长



Ohridski于2012年11月9日举行第二届巴尔干半岛社会学论坛。Hassan Berber摄。

虽然超过半个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被和区域冲突分裂等名词划上等号，也因此有了“巴尔干岛化”，不过，在第二届的巴尔干社会学论坛会议上（Sofia, 2012年11月9-10日）我们看到了巴尔干的崭新面貌。巴尔干社会学论坛于2011年11月在Tirana成立，由一群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学

家，特别是 Leke Sokoli，以及由马其顿，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学者所共同建立。这是第一次巴尔干岛社会学的制度化。此构想源自于1990年代由保加利亚社会学会会长 Peter-Emil Mitev 所提出。不过由于南斯拉夫战争，这个理念迟迟无法被落实。在了解到了历史教训和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之后，巴尔干岛

>>

社会学家知道唯有共同努力，彼此才能相互成长。所以，这群学者在 Sofia 成立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对话平台，试图想更了解彼此，让陌生成为熟悉。

当然，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巴尔干的社会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举行过许多次的会议，来自各国的学者讨论各种议题。像是这次 2012 年 11 月的 Sofia 会议就是讨论巴尔干岛如何对社会学产生社会和认识上的挑战。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巴尔干的邻国，是经济或是政治的伙伴，是阶层画得社会或是整体的社群，是教育或是文化的结构？这些都是为了共同生存和相互承认的方式之一。而过去的历史又怎么影响了各国的现在走势？当代经验可以提供给邻国作为参照吗？若是如此，那作为欧洲和世界的一员，我们的经验是具有建设性、相互性、启发性的吗？而彼此同时是伙伴也是竞争者的身份，我们所扮演的非霸权角色以及在面对知识立即的适用性时，又要怎么维系自己国家的社会学传统、关注在地问题、符合知识的有效性？总之，我们巴尔干岛国家的社会学可以在巴尔干化之外产生出普世性的知识吗？

这些问题则由 6 个主题场次和 5 个主题座谈所共同集结而乘。参与的社会学家则超过上百位。来自巴尔干岛各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科索沃、马其顿、罗马尼亚）以其西欧和北美各

国（加拿大、芬兰、法国、比利时）。因此，对话并不局限在巴尔干岛各国的学者之间而已，而是世界各国皆有之。

此外，这次的 Sofia 巴尔干岛社会学会议也呈现出了一幅社会学所熟悉的图像。制度可以为个体和组织开创必要的自我实现条件，只要制度中的行动者有清楚的制度目标和职志；此外，个体可以成为制度的动力来源，前提示后者可以认可个体和组织的努力是可以以为制度的发展和创意带来贡献。而 Sofia 会议的和作和对话意愿可以被实现，也有赖于 ISA、巴尔干研究学院、Sofia 大学、保加利亚法国研究院、保加利亚研究院知识与社会研究所、以及巴尔干社会学论坛 (BSF) 的补助和支持才得以可能。

巴尔干社会学的合作也直接承袭自 2011 年于 Tirana 举行的会议经验，这使得一年后 Sofia 会议得以可能。这样的学术对话传统也将交棒给 BSF 的第三届于马其顿举行的大会（2013 年秋季）。每年将由各个国家轮流举办。我想，一个更好的形式或许是建立在“桥与门”（Simmel 的著名比喻）之上：发展向外探索的视野，跨越国家疆界，搭起通往世界的桥梁。■

> 科际研究： 菲律宾社会学会会议

by Clarence M. Batan,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Manila, 菲律宾, RC34 (Sociology of Youth)主編



菲律宾于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在2012年19日举行社会学会议。左起Clarence Batan (PSS会计长), Emma Porio(ISA执行委员), Michael Burawoy (ISA 会长), Filomin Candaliza (PSS副会长), Leslie Lopez (PSS秘书), Filomeno Aguilar (PSS会长), Gelia Castillo (国家科学家), Stella Go (PSS执行委员)。

2012年10月19-20日，菲律宾的社会学家、实践者、学生等，以及邻国的代表于菲律宾社会学会 (PSS) 和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DMU) 共同主办的2012年大会上齐聚一堂，在 Quezon City 进行交流。约有100名的参加者与会，他们从各地的

>>

大学或是 NGO 组织前来，一起讨论“社会学和科际研究：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主题。

PSS 于 1952 年设立，是菲律宾的专业学术组织，走过了 60 的年头，和国内外的社会科学家一起积极参与知识社群的建立。这次的会议主要目的是检视社会学得跨学科性。Filomeno V. Aguilar 是 PSS 的会长，他在会议中总结道：“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有些领域必须具有核心的地位，并且维持其专业性；然而，其学者却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在地和全球的各种力量所结构形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很难完全掌握，除非我们借用其他学科的工具才行。”这个总结可说是为了为期 2 天的讨论和辩论立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ISA 的会长 Michael Burawoy 发表了主题演说，题为：Interdisciplinarity: The Promise and Danger。Burawoy “钟摆之外”的技巧，让全体与会者惊艳不已。他提出了许多基本的概念帮助我们去批判地思考跨学科性的问题。这个概念引起了 3 个场次、5 个平行讨论，总共 35 篇论文的讨论。

另外一个相似的会议重点是作者论

坛。这些作者包括了 Erik Akpedon 博士 Czarina Saloma-Akpedonu 博士和 Filomeno V. Aguilar 博士。各个场次涵盖了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学家；论坛也由著名的社会学家，Fr. John J. Carroll SJ 所主持，讨论了他人生作为一个“牧师 / 社会学家”的矛盾修饰法。此外也出版了第 60 期的菲律宾社会学期刊，主编是 Filomin Guetierrez-Candaliza 博士和 Maria Andrea M. Soco 博士。书籍展示、美食、创意主题是由 Emma E. Porio 所负责 (ADMU 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系主任) Leslie A. Lopez (PSS 秘书) 所负责。

今年的 PSS 会议不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合让菲律宾的社会学家参与，让年长与年轻世代进行交流，此外也赋予的社会学一个更具有意义、更与社会贴近、与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更加务实的较色。全球问题导致了新型态的冲突、面对、转变，因此以菲律宾为基础去连结全球南方的学者共同关注相关的问题，可说是全球南方的新社会学研究进程。这个进程则由新生代的社会学家，和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进行科际研究，积极参与在地社群，放眼全世界。■

> 社会学与社会转变

第11届SPSA會議

by Leslie Lopez,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賓社會學會秘書



Emma Porio, 主办者，举办在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的两场会议。这是在亚太社会学会的早餐会场。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的菲律宾文化院和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所负责的第11届亚太社会学会会议 (APSA) 圆满落幕。这场会议在去年2012年10月22-24日举办。此届的主题是“亚太地区的社会学与社会转变”，共有260名与会者，来自23个国家，遍及亚洲、非洲、美国、欧洲以及太平洋地区。

邀请的演讲主题包括了公共社会学、南方理论、性别、领导、知识动员等，分别由著名的社会学家主持，包括了 Burawoy (ISA 会长), Raewyn Connell (Uni-

versity of Sydney), Dang Nguyen Anh (越南社会学院), Vineeta Sinha (新加坡国立大学), 萧新煌 (台湾中央研究院), Surichai Wungaeo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Filomeno Aguilar, Jr. (菲律宾社会学会会长,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Maria Cynthia Rose Bautista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菲律宾)。

为期3天的会议共有60场座谈和180篇论文。而且议题涵盖了各个层面，像是性别、宗教、全球化、教育、气候变迁、科技等。最后的全体出席

场次是“亚太地区社会科学社群的参与”，由 Michael Burawoy 和 Emma Porio 所主持，此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Yazawa Shujiro (日本社会学会), Dang Nguyen Anh (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Ruchira Ganguly-Scrase (APSA), 谢斐宇 (台湾社会学会及中央研究院), Mohamed Tavakol (伊朗社会学会), Vineeta Sinha (新加坡国立大学), 和 Surichai Wungaeo (泰国社会学会)。

> 全球行动与在地愤怒

by Benjamín Tejerina,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西班牙, RC48會長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SA執行委員, 2010-2014



一处位于Barrio de Lanús的废弃工厂成为公民教育中心(Buenos Aires, 阿根廷)。Benjamín Tejerina摄。

集 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相当蓬勃，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社运的产生、巩固、影响、衰落的理解。而社会学也发展出了许多新的工具去研究这个有如变色龙般的社运经验。

从2010年12月开始，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抗议产生，也看到了一系列和平的占领运动。这些行动主要针对不民主以及威权政府而来。像是突尼西亚、埃及、摩洛哥、也门、巴林、以色列、西班牙、美国等国家都相继出现了占领运动。在某个意义上，这些和平的抗议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变迁，不过也有越来越暴力化的倾向。各地抗争的结果并不一致，专家也睁大眼睛在观察着。总之，这些运动透过网络快速蔓延开来，也透过网络影像的传播增大了影响力。Ma-

nuel Castells 说得好，这是一个“网络化的社运时代”。

为了检视这一波运动风潮，RC48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和 RC47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名为“从社会到政治：动员和民主化的新模式”(From the Social to the Political: New Forms of Mobi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会议举办在2012年2月于Bilbao举行。论文探讨了在北非、阿拉伯国家、南欧等地的新运动，并由 University of

>>

the Basque Country 出版。读者可以从此下载：<http://www.identidadcolectiva.es/ISA-RC48/>

去年对于 RC48 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在 ISA 第二届 Buenos Aires 举行的社会学论坛，办了将近 20 场的讨论、以及圆桌会议。这些场次开启了许多契机，像是学习社运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取向，探索创意、情绪、身体等在抗争中的角色，分析不正义与排除的视觉再现，理解科技、社运之间的关系。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听见了拉丁美洲街头的激进声音！

在这里我想要强调这些论文的理论贡献。这些论文研究了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等发生的抗争行动，包括了 piqueteros 运动、学生运动、残障运动、政治受难者运动、黑人青年运动、无土地劳工运动、无壳蜗牛运动、劳工阶级的都市抗争、关厂工人的抗争、原住民抗争、人口走私议题等等。Buenos Aires 的会议让我们坐下来面对面地讨论那些鲜为人知的抗争活动。不只是拉丁美洲的案例，其他对于民主化和社会正义有重大贡献的案例我们也都仔细探讨。

最后我们要感谢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和 Gino Germani Institute 的协助联系复厂工人和草根组织工作者。这些文章可以在专书中找到：Global Movements, National Grievances: Mobilizing for “Real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by B. Tejerina and I. Perugorria)。■

> 联合国的青年参与

by Giovanni Rodriguez,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美国

2012 年我代表 ISA 成为第一位联合国公共信息部的青年代表，主要关于联合国的青年意见的需要。会议中大家讨论、辩论各种议题，而且观点也随着国籍、种族、性别等大不相同，不过，年龄却是长期被忽略的面向。因为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关乎着重要决策与改革，所以若忽略了年龄，那联合国的决策后果可是会相当严重。把青年意见纳入，对于一些重要的 NGO 和联合国的事务推动来说，绝对有正面的影响。年轻世代也可以帮助那些运动者藉由接触和面对公众，传播讯息，去争取其诉求的达成。

2012 年 3 月我参加了 DPI/NGO 的简报会议，内容是关于 Felician College 的学生利用饮用水的卫生去提升性别平等。虽然青年朋友的报告让人很振奋，不过当报告提及 Facebook 的使用时，在场观众似乎在状况之外。例如什么叫做“pull out”？有位年长女性就说：“我甚至不知道怎么传简讯呀！”在年轻人使用社群媒体去实践 NGO 目标的同时，这场会议显然

在他们的预料之外。

社群媒体可以在带给 NGO 很大的帮助，所以把青年朋友带入联合国是很重要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要想他们和议题的关联性。例如其中一场讨论了儿童的性问题，因为那些 NGO 想把儿童的性教育列为基本人权。当我们现今仍然存在着对同性恋和性教育负面意见时，我不难想象这样的会议很难吸引像我这个世代的人。有两种东西会让我们兴趣缺缺：无聊，说教。

把这隔绝 NGO 和年轻运动者的隐形高墙拆除，联合国将会拥有两股强大的力量，继续让人道主义的改革更加成功！■

> Bedik 的真实面貌

by Eryn Snyder, Temple University, 美国



Eryn Snyder 荣获 2012 年的 Rachel Tanur 视觉社会学纪念奖 (Visual Sociology)。该奖项每两年由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颁发，并由 Mark Family Fund 赞助资金。ISA 的 Visual Sociology Thematic Group (TG05) 是该奖项的评审团。此外，TG05 也在 2008 年 ISA 会议上举行颁奖典礼。关于 Rachel Tanur Prize 的更多资讯请到 <http://www.racheltanurmemorialprize.org>

Bedik 位在塞内加尔东南边。Bedik 的女性每天要从附近的水井取水扛回城镇内，这样一天要来回 4 到 6 次。在某个炎热的午后，Indar 村内的几位女性邀我去照相。当他们自在地聊天散步时，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 Denise 和 Marie。这是我 Bedik 村文化观光摄影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去呈现 Bedik 村如何向观光客展现他们的文化特色。村人觉得我可以拍拍他

们村内女性的传统服饰和发饰以及其传统工作。所以我并不意外这张 Denise 和 Marie 的照片会是他们最满意的一张。而我很感兴趣的是他们认为这最能代表所谓“le vrai Bedik” - 真实的 Bedik。这个影像让人们觉得 Bedik 村似乎与世隔绝，未曾受到全球化的侵蚀一样。此外，这也说明了女性劳动的拜物化：背着水的女性就是非洲纯朴的代表。当我们称 Denise 和 Marie 代表着“vrai

Bedik”时，Bedik 仿佛继承了其文化传统般的纯真，女人就是文化知识的载体。那重复的姿势，背对着镜头，这幅景象也象征的某种匿名性。她们代表了 Bedik 村的活力，也代表了 Bedik 文化的韧性。扛着水的女性还代表了这个意义：自主性与优秀的能力让女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